

更值得关注 2004 年十届全运会开幕式
社会“特殊人物”也亮相。
在中国。
2004 年和 2008 年分别发生在中国
言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变化。
流行语的变迁也包蕴着时代的
发展如影随形。
能行涉及当代社会的大事体、基础能源、
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
且有信息量大、时代性强、传播面广的特点。

陆晓文 吕乐 / 著

1986-1995

中国主流媒体的 词语变化与社会变迁

ZHONGGUOZHULIUMEITIDE
CIYUBIANHUA
YUSHEHUIBIANQI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与 社会变迁(1986 - 1995)

陆晓文 吕 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与社会变迁:1986-1995/
陆晓文,吕乐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07-07090-X

I. 中... II. ①陆...②吕... III. 传播媒介—词汇
—变化—关系—社会变迁—中国—1986-1995 IV.
①G219.2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830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马少滨

特约编辑:安春杰

装帧设计:李 梅

中国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与社会变迁(1986-1995)
陆晓文 吕 乐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阿城制版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印张9.75
字 数 251千字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7090-X/H·253

定 价:19.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基本方法和原则	(20)
第二章 从官方词语类型分布看中国主流语言的特点	(34)
一、10 年间中国官方主流词语大类的分布情况及其特征	(34)
二、10 年间中国主流词语细类的分布情况及其特征	(39)
第三章 中国 10 年政法类词语分析	(45)
一、党建工作	(45)
二、法制建设	(47)
三、反腐倡廉	(50)
四、基本政策	(55)
第四章 中国官方语言经济类词语的使用及其特征	(85)
一、经济——经济体制改革	(87)
二、经济——农业经济	(97)
三、经济问题	(109)
四、经济——企业改革	(115)
五、经济——经济工作	(122)
六、经济——经济一般	(130)
七、经济——产业结构	(137)
八、经济——经济政策	(138)
九、经济——其他	(140)
第五章 中国官方语言科技教育类词语	(149)
一、科技	(149)

二、体育	(153)
三、教育	(157)
四、文化艺术	(160)
五、新闻出版	(163)
六、语言文字和文教科科技的体制改革	(164)
第六章 中国官方语言其他重要分类词语	(166)
一、价值观	(166)
二、思想教育	(171)
三、港台问题	(177)
四、外交	(180)
五、自由化	(185)
六、干部政策	(186)
七、知识分子问题	(187)
八、社会工作	(189)
第七章 中国大众媒体语言家庭类词语	(194)
一、婚姻	(195)
二、两性关系	(208)
三、老人问题	(215)
四、家庭关系	(218)
五、子女教育	(230)
第八章 中国大众媒体语言社会类词语	(244)
一、时事政治	(244)
二、精神与文化生活	(253)
三、社会问题	(261)
结束语	(305)

前 言

在中国人的传统和意识中,“立言”是人生成功的最大标记,孔子就是依靠“立言”而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万世师表”的地位。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立万世不朽之言的可能性不仅微乎其微,甚至企图立“隔年之言”的愿望都变得十分困难。政治、经济、科技、生活、文化等社会诸方面的快速变化,人们的交往形态与方式的迅速变异,社会交往范围的急速扩大和不同语言之间交流频率的急速攀升,使得今天中国社会中不同的人 and 群体使用的语言变化速率大大提高,而且整个社会的文风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以载道”的传统训言也被一些善于“调侃文学”的人搞得稀奇古怪。尤其是如今网络上的语言,对一些从来不上网的人,简直就是天外来客使用的语言。就是官方媒体,在语言的使用和种类上也变得更灵活和具有选择余地,大量来自社会、民间的鲜活词语成为官方语言体系中的关键词语。

从 21 世纪起,中国开始了一个年度流行词汇的发布活动,这个活动既包括了对官方主流媒体中流行语言的概括,也包括了一些民间词汇的总结。近年来,还有不少人网络媒体上的流行语言 and 变化进行研究。如 2006 年 1 月 12 日,“2005 年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联合发布了 2005 年中国主流报纸综合类、国际时政类、国内时政类、经济类、科

技类、教育类、体育类、文化娱乐类八个类别的十大流行语,另外还发布了2005年港澳台专题和廉政专题十大流行语。以上这几个方面流行语的分布如下:

综合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十一五”规划、神舟六号(神六)、节约型社会、和平发展、一篮子货币、油价上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连宋大陆行、取消农业税;

国际时政类:联合国改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审判萨达姆、东亚峰会、伦敦连环爆炸、“卡特里娜”飓风、巴黎骚乱、第四轮六方会谈、南亚大地震、四国争常;

国内时政类:反分裂国家法、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矿难、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社会救助、文化外交、苏丹红;

经济类:个税改革、纺织品谈判、经济普查、汇率改革(汇改)、股权分置改革、工业反哺农业、房地产宏观调控、青藏铁路全线铺通、循环经济、百度上市;

科技类:载人航天飞行、禽流感疫苗、深度撞击、太空探测、破译“生命软件”密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龙芯2号”、燃料电池、纳米新技术、黄禹锡事件;

教育类:免费义务教育、教育公平、校园安全、阳光工程、孔子学院、四六级改革、加强职业教育、高考移民、取消博导终身制、博士生四年制;

体育类:福娃、十运会、奥运经济、奥运市场开发、奥运吉祥物、丁俊晖、节俭办奥运、奥运特许经营、伦敦申奥成功、姚麦组合;

文化娱乐类:超级女声(超女)、千手观音、中国电影百年、复兴国学、香港迪斯尼、《大长今》、《无极》、平民偶像、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博客;

港澳台专题:台湾水果、马英九、台湾“三合一”选举、曾荫权、春节

包机、破冰之旅、第四届东亚运动会、香港世贸会议、香港政改方案、赴台旅游；

廉政专题：官煤勾结、行贿黑名单、审计风暴、境外赌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官赌、《公务员法》、问题高管、《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反腐倡廉能力。

流行语言词汇作为一种变化的符号表征，最能敏锐反映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流行语涉及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现象与时弊，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人生意义、生活方式、爱情、友情、就业、消费、时尚等，时代性强，传播面广，反映着当代社会时局与人们文化心态的变化。一方面，流行语出现频率相当高，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新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为受众提供了观照全年社会各领域变迁的种种可能，跟踪流行语，正是跟踪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方向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它从特定的角度，表达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另一方面，流行语又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研究价值，是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对汉语报刊词汇、新词语及汉语词汇学的进一步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流行语的研究，对各类媒体用语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相对于流行语的学术意义，公众更为感兴趣的，恐怕还是流行语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流行语都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如果我们对比 2004 年中国社会的流行语，就会“恍然大悟”地知道，在中国，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发生了什么。2004 年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DCC 博士研究室对 14 家主流报纸 49000 万字的语料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是：

综合类：执政能力、雅典奥运、刘翔、审计风暴、零关税、科学发展观、失地农民补助、反分裂国家法、中法文化年、海啸；

国际时事类：布什连任、阿拉法特病逝、纺织品反倾销、艾滋感染、

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虐俘、欧盟东扩、油价上涨、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三轮六方会谈；

国内时事类：审计风暴、廉政公务、第二代身份证、以人为本、宪法修正案、食品安全、电荒、性别失衡、公民道德教育、中超；

经济类(国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失地农民补助、经济普查、联想收购 IBM PC、汽车新政、公款炒汇、阶梯水价、升息、政府采购、救市(拯救股市危局)；

文化类：中法文化年、网络著作权条例、人造美女、《十面埋伏》、红色经典、审美疲劳、博客、《可可西里》、电影分级制、环球嘉年华；

科技类：SARS 灭活疫苗、转基因食品、下一代互联网 CERNET2、火星探测、嫦娥工程(绕月探测工程)、中国北极黄河站、双模手机、曙光 4000A、“光池”(储存电磁波立方体)、大风蓝色预警；

突发性事件专题：海啸、人质事件、高致病性禽流感、东航空难、马德里爆炸、矿难、大兴安岭火灾、小浪底沉船、震荡波病毒、山体滑坡。

语言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变化，流行语的变迁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流行语涉及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焦点问题，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信息量大、时代性强、传播面广的特点，准确、生动、及时地反映着当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中国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从流行词语的变化中寻找社会变迁的脉络，是一种从生活细节中探求重大历史变化的角度，是一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靠近真实中国的视角。

流行词语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从流行词语的变迁可以看到社会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二十多年来，大量诞生的流行词语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特色、万元户、下海、打工、美容、春节晚会、涉外饭店……”，到 90 年代的“围城、传销、卡拉 OK、炒股、BP 机、写真、进口大片、网吧、MBA、盗版、知识经济、酷、隐私……”，再到 21 世纪以来的“MP3、宽带、唐装、

手机短信、彩信、网上购物、谁动了我的奶酪、入世、反恐、与时俱进、CDMA……”，流行词语的变迁史是我们物质生活和观念变迁过程中最忠实的记载工具。从“大哥大”到“手机”，从“磁带”到“MP3”，从“录像带”到“VCD”、“DVD”，从国内游到出境游，从“复关”到“入世”，从“申办奥运”到“人文奥运”，从“美容”到“人造美女”，从追求“绯闻”到树立“媒体责任”，从“小资”到“BOBO 族”……这种种变迁不仅包括了我们传统观念的更新，也记载了我们对世界的全新的认识。

公布每年的流行语固然是必要的，然而把流行语用历史与时间连贯起来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这样使人更容易地理解产生这些流行语的背景和原因，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如 2004 年的“失地农民帮助”到 2005 年的“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多年来“三农”问题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把有关“三农”问题的词汇向前推，就会发现，似乎一夜流行的词汇实际上是有相对应的延续过程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 1988 年，关于农业问题的词汇只有一条，就是“农业偏冷”，1989 年有两条，一条是“吃农坑农”，一条是“农业问题”，1990 年和 1991 年没有涉及，1992 年以后有关词汇大量涌现，而且词语生动，许多明显是民间的创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采用这些词汇，表明了这些词汇在民间已经大量流传，如 1992 年有“害农、坑农、卖粮难、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卖棉难、挖农业”，1993 年有“以工挤农、吃大户、打白条、挖农补工、挖农民、种田难”，1995 年有“口头农业（喻指在农业问题上只说不做）”。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论述和政策也不断涌现。实际上，农业问题是一个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就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并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重大问题。一个词语的流行并在一个时期的集中使用一般源于两种状况，一是出现了重大的事件或新兴事物，再就是经过多年的积累而“聚沙成塔”，酝酿的自身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在 2004 年和 2005 年的综合类流行语中都有涉及“三农”问题的词语，实际上问题在 10 年前

就开始了。

在21世纪之初中国开始公布不同领域中的流行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动,但是,这样的活动中公布的只是某一个领域中在一个时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而且只有10个词语,这对了解某一领域的整体状况和复杂社会中的整体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在一个流行语的背后往往有一个相伴随的关联词语系统,只有了解了这个词语系统后,方能对这个流行语本身实现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例如,2005年综合类流行语中第一个流行语就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何在2005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如此规模的党内教育活动,而且这个教育活动的内容细则之详细和程序规定之多是以以往任何党内学习教育活动所不具有的?回顾十几年来党建工作的发展脉络,我们便可知道开展这样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仅从《人民日报》1986-1995年10年间的有关文章看,关于党建的词语比例非常高。在我们相关的研究中,党建的词汇在有关政法类词汇中占据了4.32%的比例,反腐倡廉的比例为6.61%,两者相加为10.93%,这个比例仅次于关于国家建设基本政策方针的有关词汇,居于第二位。由此可见,不是中国共产党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个有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毫无察觉并不采取行动,而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终成为压倒一切事情的重要工作。我们从具体的词语变化中可一定程度地把握和了解导致这个结果的过程。

如2005年的流行语中的“廉政专题”,这个问题更需要从一个过程中来进行把握和了解。导致这个局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1986年《人民日报》的有关词汇中,只是概念化地提到了“经济犯罪”,而在以后几年的词汇中,关于经济犯罪问题的词汇越来越具体化,1989年有“非法收入、(经济)腐败、偷税漏税”,1992年有“假冒伪劣、抗税”,1993年有“金融大案、挪用公款、偷税漏税、走私”,1994年有“倒卖发票、偷窃发票、非法集资、非法印刷发票、国有资产流失、截留国家收

人、骗税、受贿、偷税、漏税、欠税、伪造发票、盗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执法违法、走私贩私、走私致富”。从1986年到1995年,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高涨时期,而从中国最大的官方报纸和最具权威的文章栏目中反映的一个事实是,在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常是经济犯罪的高发阶段,而且在中央出台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同时,几乎都有相应的经济犯罪手段与之对抗。政府采用价格双轨制,有人就倒买倒卖;政府采取利改税,有人就偷税漏税,倒卖、盗印和虚开增殖税发票。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有人利用经济体制改革,大肆瓜分国家资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词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的出现,充分说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经济犯罪。如果仔细观察以上这些词汇,就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问题背后,都有一个鬼魅般的影子,这就是某些官员的腐败和贪婪。1986年以后的词汇中有许多与“官倒”有关,1988年有“官商合一”,1993年有“带权下海”和“双重行为(市场、行政合一)”。这些极具形象和概括性的新词汇,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好的注解。通过一个系统性的词汇能够对一个流行的词汇进行历史和原因上的解释,如通过以上各种关于经济犯罪和腐败的词汇就能对2004年流行词汇中的“审计风暴、廉政公务”有确切的感受和认识。词汇——词汇系统——社会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是我们做此课题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过程上看,从2002年开始主办方组织一批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中国15家主流报纸2002年1月1日至12月25日近一年共5亿数据作为语料进行定量、定性统计分析,筛选出30个备选词汇,并于次年12月25日向社会公布;12月26日零时至12月31日24时,这30个候选词汇接受公众网上投票及线下投票;再经由3家机构汇总投票结果并结合计算机统计分析,最后,十大流行语宣布“诞生”。因此,这个过程不排除具有一定的主观偏好色彩的可能。

正是鉴于以上的状况,我们把在1997-2001年中进行的有关中国

主流语言词汇变化的研究公布出版。我们的目的是向对语言变化及其社会意义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个历史记录和有关资料,进而从一定侧面向人们展示一个中国社会的实际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在已经有过的语言文字中有过详细细致的记录,并可以从这种记录中追溯中国社会走过的发生了种种变化和充满曲折的道路。

二

这个研究从1997年开始,在2001年结束,并获得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本研究的对象是1986—1995这10年间中国主流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这个1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10年,这些举世公认的变化涉及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1984年年底起,中国开始了至今仍在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土地承包制度在农村获得广泛成功以后,对执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在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拉开了序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

自1980年我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经济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是一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据此,《决定》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造就一支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加强

党的领导,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全面展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念的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都是在那个节点上开始的。中国主流媒体中的整个话语体系都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地发生变化。而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是这个话语体系中对社会最具敏感性的部分。可以说,这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语言词汇的变化中找到痕迹,这些变化可见于日常用语、经济用语、政治用语、交际用语、学术用语等众多语言使用领域。即使有一些词语虽形式依旧,但其概念内涵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各阶段中各种新词大量涌现,而另一些词语却淡出了使用领域;一些词汇在某一阶段流行一时,而后来则渐渐被人忘却;也有一些词汇始终被频繁使用,而且其概念意义的核心始终未变。如此等等,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中的剧烈变化,留下了社会发展的深深辙痕。从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今天的干脆直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汇,其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微妙改变,决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它们反映的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

之所以对1986—1995年的有关语言进行收集、梳理与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从1984年起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起始点。在这个起始点以前,中国的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且在经济领域中个体经济也开始出现,但是作为计划经济制度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而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已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发生变革和转轨的开始。第二是在1986年以前,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逐步从“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中走出的过程中,不仅许多语言还带有“文革”时期的痕迹,而且在社会中仍保留了许多那个时

代的内容,但又由于“拨乱反正”的进行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社会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而且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变化,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今天依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此1986—1995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段,是一个开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时代,这些变化导致的语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1949年以后和“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化。

之所以要以10年作为一个时间长度,是因为语言的产生、运用和消退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平时,人们往往注意有哪些新的词语出现,因为这些语言词汇的出现体现了新的事件、行为、思想和价值,但往往不会去注意有哪些语言在消失和隐退。实际上,这种隐退也是某种价值、思想、行为方式和事实的消失或淡化的过程,新词语的出现与旧词语的隐退往往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些词语的出现和隐退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在“文革”结束以后,“文革”中使用的语言并不是马上消失的,而是慢慢地消退。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样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是一种“死”的词汇,在今天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是在“文革”消失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这个词汇是党和政府有关重要政策的体现,也是对“文革”中“臭老九”观念的一种否定,是一个非常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特点和走向的词汇。但是在90年代以后,这个词汇就逐步消失和不被使用了。所以,对语言的观察和分析不仅需要现时现地地提取,而且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淘洗。

虽然人们的口头表达是“一言即出,驷马难追”,但多年来留在固定文本上的词语变化却是“白纸黑字,有案可寻”。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尤其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过去社会遗留的文本资料是了解和解释当时社会最好的材料和有效途径,从已有文本的词语概念中可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当时社会的结

构、风气、特征甚至冲突,并可从词语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影响社会变化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终极体现。这就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着眼点之一。

学术界从来就对语言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极为感兴趣。人类学家从不同民族的亲属称谓系统中总结出了不同社会的结构、亲属系统和婚姻制度,历史学家从不同的文字记载中理解、阐释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当初的研究设想是:既不像人类学那样寻求描写某特定人类群体固有的人类文化现象,也不像历史学那样去追溯过去的历史事实,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距离今天社会不远的一段时间中以及在其延伸中变化着的语言现象,以此透视这一社会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整体变化特征。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于20世纪60年代在英美诸国兴起,几十年来,社会语言学从宏观研究发展到微观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其核心内容始终是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从社会到语言,从追溯语言变化和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开始,落实到语言的变化和差异,而我们的研究是从语言到社会,即从语词的种种变化中寻找社会变化的痕迹和走向,因而,我们所要做的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我们试图从最常见、最普通、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语言现象中去勾画社会发展的轨迹,透视社会的概貌。

在中国的学术界,当初就有人提出应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语词意义进行耙梳和整理,对一些学术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例如,有人提出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语库”,免使那些特殊的语言形式、特殊的语言意义和特殊的用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中国最大的辞书——《辞海》针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众多词语概念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定义;还有人对外个别词语,如“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等词语进行重新定义和再解释,并进行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所有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给予我们以启示,使我们看到

类似的学术工作的意义所在。

因此,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新的尝试,是试图在中国的语言社会学研究领域开始一种新的探索,并使这种探索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社会历史意义。

(一)对某一社会时期的词语变化不但进行个体的研究,而且进行整体理解、综合、统计和分析,以追踪和揭示社会变化的概貌。

我们认为,从1949年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社会语言使用的剧烈变化时期,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二是“文革”时期,三是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试图从中截取一个时间段,即从1986至1995年作为我们研究的范围。

基于语言变化是社会变化的集中生动的表现,我们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1. 从语言的变化中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10年来政治变化的特征和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对以前的某些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如1982年经修改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修正和确定;如从提倡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到今天的公务员制度,从干部终身制到干部任期制的变化;如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部分权力的下放,等等。在发生以上诸种变化的同时,均有一系列党和政府的文件、文章与之伴随,社会媒介同时进行宣传,并伴有理论界的论证和讨论。因此,多年来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文件和文章资料,并形成了众多的概念和观点,留下了大量可供研究的语言文字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和认识这段时间中中国政治的变化及其特征。

2. 从语言的变化中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10年来经济变化的特征和趋势